

■ 学术前沿: 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研究

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的机理及路径

任保平, 刚翠翠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中国转型已经由前转型时代向后转型时代转变, 后转型时代转型的范围已经由经济转型扩展到了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分为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人文转型两个方面, 社会结构转型通过人口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来促进经济发展, 而社会人文转型通过人的转型、人格形态的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来促进经济发展。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后转型时期, 转型范围已经由单纯的经济转型转向了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在后转型时期应通过实施新人力资源政策、实施新型城市化、加快社会信息化、推进社会知识化、倡导合理消费的理念和实施和谐战略来加快我国社会转型, 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转型; 社会人文转型; 经济增长质量

中图分类号: C912;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4)01-0021-08

收稿日期: 2013-11-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13JBG014); 陕西省重点学科理论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

作者简介: 任保平, 陕西凤县人, 经济学博士,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发展观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同时要“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相互促进,关联性很高。^[1]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经济转型基础上,以调整社会结构为主线,力求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增强人的发展潜力,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人们的社会福利,保持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稳定的转型。当代中国的转型包括四个层次:一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指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效率提升的转型;三是社会转型,指社会从传统封闭社会向现代开放社会的变迁;四是全球化的转型,即由封闭体系向开放体系的转型。社会转型意味着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解体和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建立,其实质是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演进。社会转型具有多重特征,主要表现在社会结构的转型

和社会人文的转型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影响是不同的。目前中国转型已经由前转型时代进入后转型时代,转型范围已经由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领域。在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型中,由于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主体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相应要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做出调整。^[2]社会转型的进行必然影响着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这个基本命题的解决,因此必须重视社会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促进作用,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一、社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 质量提高的影响

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骨架,现代社会既要有现代化的经济结构,也应有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主要包括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及阶层结构等方面,其中“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社会阶层结构”^[3],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决定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主要因素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

结构要素的变迁是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标志。^[4]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变迁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1. 人口结构的转型使经济增长更富有效率

在经济思想史上,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从马尔萨斯模型到新古典增长模型阶段、索洛—斯旺模型和拉姆齐模型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阶段、增长模型中家庭生育率选择的研究阶段。在增长模型中,人口因素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并以新增长理论为依据构建了微观基础。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实践来看,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口的素质和结构两方面。

新古典经济学以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为特征,以资源配置为研究中心,其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供给不变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而刘易斯将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无限供给假设引入经济学领域,建立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这一模型把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认为农村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增长中,可以获得在工资不变基础上的任何劳动力供给。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就呈现出一种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只有当现代部门把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以后,二元经济结构才能转化为一元化现代经济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吸纳的这个时点也被称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转折点”,也称作“商品化点”^[5]。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主要通过生产效率,社会福利,技术进步等对增长质量产生影响。

不同的人口结构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当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总人口增长速度的时候,则人口抚养比例较低,生产效率一般都比较高,即进入人口红利阶段,在此阶段由于人口抚养比较低,家庭消费占比就会比较低,储蓄率逐渐上升,从而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同时由于适龄劳动人口的大量出现,直接接受和采用新技术、新想法,将促使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加快,间接提高增长质量;而当适龄劳动人口的增速小于总人口增速的时候,即人口抚养比较大,人口红利消失,生产效率一般比较低,较高的人口抚养比迫使家庭消费以及国家公共支出的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政府投资降低,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新技术采纳的成本增加,不利于技术的扩散,会抑制技术变革对于增长长期带来的影响,间接降低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用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间完成了走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的历程,即从高生育阶段进入低生育阶段,较之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的增长与发展速度都令人惊叹。一方面较早发生的人口

转变,导致从高少儿抚养比阶段向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的转变也较快地发生,并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期^[6],但目前中国人口红利在逐渐消退,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劳动力的供给发生了改变,从而影响着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人口结构的转型导致劳动力的成本增加,需要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使经济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向依赖人力资源红利的转变,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2. 就业结构的转型使经济增长更为合理

就业是指在劳动年龄范围内,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人通过参加社会劳动并取得相应收入的经济活动。就业是劳动者谋生的手段,是劳动者获得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的基本前提。从社会生产全过程的角度来看,就业是实现活劳动要素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结合,从而创造社会产品,促进经济增长。一个社会的就业状况不仅反映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水平,也直接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状况。

就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来实现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影响,就业结构的变动是产业结构转变的动力,而产业结构的演进是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基本特征。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工业部门的收入比农业部门多,商业部门的收入又比工业部门多。威廉·配第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进一步提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逐步转移,在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的过程中,劳动力再向第三产业进行转移。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演进,其趋势是由劳动要素密集型产业向资金要素密集型和技术要素密集型产业方向转化。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化,就业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而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则进一步提高。从当前中国的就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的发展相对于其吸纳的就业人数来说显得不足,农业劳动力迁移趋势明显,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则超出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工业劳动力明显不足;第三产业的发展则相对均衡^[7],可看出解决工业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它带来了所有要素的全面过剩,是影响工业企业增长质量的主要问题;第三产业虽然发展均衡,但是服务行业仍然存在着整体质量不高,主要服务于工业行业,高端服务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是今后服务业的主要增长点之一。

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型使经济增长的演进更为和谐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运用结构分析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特殊性的理论。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城市以现代经济为主的非农业部门与农村传统维

生部门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包括产业二元结构、区域二元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形成了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多重制约。

第一,从资源配置层次来看,在二元经济结构格局的约束下,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有机结合受到抑制,尤其是劳动力流动性过低,导致农业部门过剩的劳动力无法实现有效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三农”问题的形成。依据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系统主要包括两大部门:一是传统农业部门,生产技术相对落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相对较低,且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二是现代工业部门,生产技术和生产率相对较高,除资本大量聚集之外,受劳动报酬过高的影响,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张,不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与此同时,城市规模随之扩大,全社会整体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最终推动经济社会从传统二元结构向现代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但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城市化发展程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尤其是工业化发展并没有为农村广大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充足的动力,而且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有效改善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最终成为“三农”问题有效解决的主要制约因素。第二,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由于城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改善,引起农业部门整体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影响着社会总需求的扩张以及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目前,中国经济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产业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差距在日益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占全国人口近一半的农村人口消费需求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既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也使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难以实现。第三,从制度变迁层面来看,二元经济结构加速了“双重演进”特征的形成,从而增加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成本。当前,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具有双重性:一是经济体制要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具体目标是在城市部门要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农村要进一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为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二是经济结构要从传统二元结构向现代一元结构转型。制度变迁的过程不仅要与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相一致,并且要通过制度变迁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支持,正是这种制度变迁的“双重演进”特征,不仅延缓了我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也使经济转型的

成本不断增加,加剧了制度变迁的风险。第四,从结构转变层面来看,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人口结构转变与产业结构转变的不一致性凸显。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转变,一般来说,结构转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即工业化过程;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即城市化过程;三是工业部门内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内部结构的高级化过程;四是服务业部门与其他产业的结构变化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过程。上述四个方面结构转变的核心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践结果表明,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政府部门将资源配置于工业部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促进城市部门的发展,尤其是部分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导致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8]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意味着传统部门逐步转化为现代工业部门,农业劳动生产力将得到不断提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与此相适应,劳动力将不断地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并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原材料,推动现代经济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可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要素条件的支持。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要通过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互动作用来实现。一是通过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收农村过剩劳动力,带动传统农业部门的改造。二是通过农业部门的发展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要素支持与市场条件。在传统与现代两大部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良性运动中实现经济结构从二元向一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因此,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迈进即工业化的过程,这一进程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4. 社会阶层结构转型使经济增长更具有人文关怀

社会阶层是指利益分化完成之后所形成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相对稳定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是有诸多共同利益和意识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不同的社会结构代表着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不同利益。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则是占有不同资源的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积极的影响。

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种社会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传统社会阶层结

构中,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社会阶层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推动了经济结构快速转变,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社会群体的结构变化提供了历史契机。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传统社会的一些群体发生了分化并逐步走向衰亡,一些群体则在社会转型中再度崛起,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又孕育出了新的社会群体。近代社会群体的这一巨大的重组是一次历史进步,预示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进趋势,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一是社会群体的分化有利于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传统身份等级社会强调先赋性和社会习惯,而契约社会则是重视按照利益关系订立的规范和协议。在社会转型中,用契约关系取代身份等级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限制,用后天努力取代禀赋资格。二是社会群体关系的重组使得阶层之间的界限清晰化,阶层独立意识增强,阶层之间以及阶层内部的社会之间的联系开始流动化、松散化、灵活化。这可能会增加不稳定因素,但也有利于人们表达各自利益诉求。三是社会群体的分化对社会成员的构成发挥着改善和调整作用。经验证明,阶层分化是一种进步。社会阶层分化的本质是社会分工,是社会分工原则在社会阶层构成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成员的激励作用。^[9]

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转变为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提供了空间。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加强,为人的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空间,使社会资源的配置进一步合理化,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和分配方式,既是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原因,同时又为效率和公平的结合创造了条件。社会阶层分化强化了竞争和激励机制,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形成了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动力源泉。

二、社会人文转型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影响

社会人文的转型包括人的转型、人格的转型、人文精神转型和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型,这些方面的转型也促进着经济增长质量的不断提高。

1. 人的转型迫使经济增长更注重伦理规范

人的转型是指乡土社会的人向市民社会的人的转型,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费孝通先生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0]316} 乡土社会的特征是封闭、保守的,人的流动小,“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10]7}。乡土社会是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是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内在要求要培育出市民社会,它是一个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社会。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中,人们由熟人之间的合作进入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化是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现代社会对于人的转型主要通过以下几点实现:第一,法治意识的增强。在市民社会中,由于一般采用依法治国,因而法律是整个社会运作的基础工具,每个人在生产以及生活当中,都以法律作为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据法律内容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在法律这种正式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经济活动。第二,提倡宽容精神。宽容精神是一种道德标准,也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化,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影响与协作,冲突与矛盾并不能有效的解决市场经济的一般问题,反而是合作与宽容能够有效的降低交易成本,因而在法律的强制手段下,更需要宽容的精神。由于人类社会的不断演进,宽容替代冲突是人们对自我的一次反省,它能够消除敌意与冲突,以最小的成本化解伤害,这是市场经济发展下最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宽容不但标志着市民社会比传统社会更加文明,而且降低了交易费用,使市场经济在市民社会的运作下更富效率,更注重公平,更符合经济增长质量的伦理规范。第三,普及公民理性意识。这种意识将作为市民社会的人和作为公民的人看作是同一个人,更能使人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注重平等、公平、自由与安全,全面提高公民的素质。

总之,由于在人的转型过程中,以契约合作精神为主线的市民社会的精神不断融入经济生活当中,使得经济增长会更加具有包容性,更注重公平与公正,自由与安全,更注重伦理规范,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2. 人格形态的转型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传统走向现代

人格形态的转型是指由依附型人格向独立型人格的转型,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个人的行为选择依赖于组织单位。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个体具有相对的经济自主性、政府在总体上发挥作用,此为领域分离的表现。领域间的关系不再是‘中心—依附’的等级结构系统,而是一种网状结构系统”^[11]。在这一结构系统中,要求每个主体都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只有当人具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时,才能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主

经济,要求人必须从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人的一切行为方式是由当时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市场经济社会具有现代化的运行机制,这一运行机制要求人格形态的转型。依附型人格是自然经济的产物,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独立型人格。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获得价值的经济,在市场竞争中要求每个经济主体必须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取胜。市场经济也是优胜劣汰的选择经济,每个个体都必须依据市场法则自主选择,并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市场经济突出经济主体的主体性,主体性要求经济主体具有独立、平等、自由的人格特征。总体来看,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要求人格形态的现代转型,同时这种人格形态的转型又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不同的人格模式适应于不同的经济模式,从而对经济增长间接产生影响。在自然经济下,由于科学技术的有限性,人们必须学会相互依赖,建立各种生产关系,形成了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模式。而在市场经济模式的运行环境下,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在这种状况下,每一个人都能力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形成独立人格。这种人格意味着在市场经济自由交换中,个人能够自主选择生产或者消费,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价值能够比先前的依附人格得到更大的体现,因而独立人格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是一种独立自主性的生产活动,生产者依据市场信息和理性判断来决定生产,分散决策,也承受着相应决策带来的成果——优胜劣汰,适应生存。而消费者则遵循着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自己的消费组合,可以说市场经济下的人具有追求个人利益的愿望,在利益的内在驱使下,所有的人都在参与市场竞争,既独立承担风险,也独立获取收益。要想在充满竞争的市场中站稳,就得不断创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市场竞争有助于独立人格的培养。正是有了这种独立人格,才铸就了宏观增长过程中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合理分布。在非独立人格下或者在计划经济下,整个社会成员被固定在一定的等级中,所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按照国家宏观指令有序进行。在今天看来,这不仅有悖于人性自由的基本伦理,更重要的是迫使政府必须工于精打细算,有一个全能之手去满足整个社会所有需求的运筹,导致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且一旦失误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个人多只能消极适应社会要求、机械服从社会规范,丧失了其主动性,成为被动的客体,人无独立人格可言。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给社会带来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就是个人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造就了无数利益相对独立的经济行为主体,使人

格独立真正建立在物质基础上。^[12]

因此,与独立人格相适应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使得经济增长打破了传统依附型人格下的增长模式,根据现代人的需求,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基本出发点,以利益最大化为生产目标,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增长方式。

3. 人文精神的转型使经济增长的方式更为现代化

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是对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注。它是以人的理性意识、价值意识和实践规范的有机结合来构建的人的主体性。经济增长质量是一种价值判断,人的生存与发展是经济增长质量的终极价值判断。从传统社会的人文精神转向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人们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形态都会发生转型。人文精神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也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精神动力,其转型使经济增长的方式更为现代化。在不同经济体制背景下,人文精神有不同的内涵与形式。人文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融合创新从而达到对自身认识的深化,需要依据时代背景的变化而不断地转型。人文精神转型的目标是把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以现代商业精神为主体的现代人文精神相结合,形成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精神动力。

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具有“勤俭节约”、“重积累,轻消费”等特征,可以促进中国储蓄率的上升,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传统人文精神中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可以促进环境保护,降低生态环境代价,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传统人文精神中把人文关怀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每个人的行为之中的理念,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需要的人本主义终极关怀是一致的。因此在人文精神的转型中,要重视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合理成分的吸收,建立起具有时代特点的,能对经济增长质量起提升作用的新人文精神。

在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促进人文精神转型还需要发挥现代商业精神的作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得益于其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注重诚信的职业伦理。在中国人文精神的转型中,要实现以现代商业精神为主题的现代人文精神转型。首先,自由和平等是现代商业精神的基本精神。建立公平合作和平等参与的社会基本制度,是市场经济追求的目标。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使劳动者能够展开公平的自由竞争、平等参与和共同承担责任机制。这种机制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经济

增长的质量。其次,现代商业精神重视创新。重视技术进步,重视产业创新,重视产品创新,重视市场创新也是现代商业精神的重要方面。熊彼特对创新精神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资本主义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形式,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产业创新、产品创新和企业创新都可以充分利用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最后,现代商业精神重视契约原则。契约原则是由于商品关系产生的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原则。契约精神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只有市场主体遵守信用,才能促进市场繁荣、推动市场创新,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人文精神转型中,要把以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以现代商业精神为主体的现代人文精神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人文精神的转型,使经济增长的方式更加现代化,从而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精神动力。

4. 生活方式的转型使经济增长的结构更为合理

生活方式的转型是指从传统生活形态向现代生活形态的转变。在传统形态生活方式中,人们的消费层次低下,重积累、轻消费;而现代生活方式中,人们的物质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且逐渐多元化,消费不再是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而成为人的物质享受,引领着生产活动。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传统社会形态的特点是集体规则抑制个体自由。在现代形态的生活方式中,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进一步突出,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需求,日益转向休闲活动和娱乐活动,带来更多的个性化特征,社会对于个人生活的限制逐步减少。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这种变化体现了人的能力需求层次的提高。传统生活方式中人们的生活节奏缓慢,而现代生活方式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进而引发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

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一方面,生产决定消费,这就意味着产业结构决定着消费结构。在生产中投入一定比例的生产资料,若能实现充分生产,产业结构就被确定。此时如果产品能够被完全消费,则消费结构也将随之确定;如果生产出的产品不能被完全消费,还有剩余,会引致厂商下一轮在生产该产品时缩减生产规模,逐步实现生产和消费均衡。另一方面,消费引导生产,即消费结构变动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当居民消费需求及其结构发生变化时,市场信号会引起投资方向变化,从而改变产业结构,使其发生变动。

三、以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路径

当代中国的转型已经由经济转型阶段转向综合转型阶段,转型的范围已由体制转型、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社会转型不是单纯的社会制度的转型,也包括社会结构转型,即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因而通过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路径在于:

1. 实施新人力资源政策,实现人口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均衡

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已进入老龄化阶段,人口红利正逐渐消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就要寻求新的增长红利,其中人力资本红利即其一,就是通过提高人口整体的素质,来解决由于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问题。推动从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重点要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与经济结构的错配现象,与产业升级相配套,面对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日益兴起和对人力资本、研发技能等先进要素需求日渐增长的现实,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主要途径是改革人力资源的培养机制,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结构,使教育为整个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支撑;同时要重视劳动力和素质提高,完善创新人才的管理制度,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新型经济的形成提供高端人才的支持,最终通过劳动力供给结构升级来保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实现。除此之外,要完善创新人才的激励制度,为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转变创造制度条件,使经济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在质和量上相互适应和匹配。

2. 实施新型城市化,建立城乡平衡社会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地向城市地区集中和集聚,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依据经济发展理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在20世纪西方国家完成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背景下,传统城市化带来的是不合理、高污染的工业布局。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工业化的发展将“二元”转变为“一元”,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存在着技术不发达,农村人口相对过剩的局面,若是按照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必然要走依靠以消耗能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外延式城市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战略除了影响增长的质量之外,还会加剧二元经济结构的分化。新型城市化则与传统城市化不同,它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上,强调生态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是一种统筹城乡的和谐发展方式。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要素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

以及金融市场的分割则将因新型城市化打破传统市场体制、城市管理体制造成的障碍而被统一。新型城市化“强调充分发挥城市与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建立城乡统一的市场,使城乡各生产要素在流动与循环中达到最优化配置和功能互补”^[13],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让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进行有效配置,解决城乡二元就业结构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新型城市化在产业结构上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心城市作为周围区域的发展极,中小城镇以生产性功能为基础充当中心城市向农村扩散的中介,以及农村向城市集聚要素的节点,而农村以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支撑城市对要素的需求,实现城乡双向流通的统一。

3. 加快社会信息化,促进生活方式的变革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深化,信息资源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因这些信息资源分散而无法共享,制约了地区、部门间的信息交换与共享。信息的不畅通和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不健全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因此大力推进社会信息化战略是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途径。

社会信息化是指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应用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加速现代化发展。社会信息化建设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企业信息化建设、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社会信息化系统建设和社会管理信息化。实现信息资源跨部门、跨行业的整合和共享,可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社会信息化一方面运用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改造传统产业,通过应用通信、网络等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生产过程智能化、管理方式信息化、营销手段信息化来为工业化发展提供数字化、电子化的生产装备支持,为推进工业化提供系统软件支持。另一方面强化信息资源共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问题,不仅促使社会和谐发展,而且有利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4. 推进社会知识化,加快劳动力结构的转变

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使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知识化战略的实施,我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劳动力结构由传统工人阶层向现代知识阶层的转变,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量。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工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迈进,第三产业不断成长。在现代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产业有不断增长的趋势。知识的创新不再是为了农业以及工业生产工具的需要,而是要整合知识创新,跨领域地应用知识。因此,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也必须提高,要通过知识的积累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

置。同时,由于传统农业的改造,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以及新农村的建设也要求农民必须提高知识技能,以适应未来知识经济的需要。

实施知识化战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需要从普及教育和创新教育两方面进行。普及教育的任务是普及科技教育,培养科学态度,发展科学研究能力,增强创新意识;提供更多参与科技活动的机会,提高创新能力;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活动,增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指导各类科学教育活动,大力开展科技培训等。^[14]而创新教育的任务是鼓励知识创新,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要制定政策法规,加大公共教育投入,鼓励知识和技术创新。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风尚,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5. 倡导合理消费理念,为消费结构优化提供支持

由于消费结构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来改变增长质量,因而适时地引导消费结构或者为消费提供良好的保障成为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在引导消费结构方面,首先要确保社保制度的完善。社会保障作为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保障体系,对人的消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体现了整个社会的福祉,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倾向,提升消费层次,从微观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正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基本伦理要求。因此,政府应该在社会福利方面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提高社会保障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继续拓宽以住房、医疗等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的范围;建立规范、透明、适应市场要求的经济管理体制,从而形成一种正常、健康、合理的消费体制,使得产业结构能够依据良好的消费结构释放的信号进行调整和变动,从而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提高增长质量。

但是这种社会保障的建立应以提倡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使人们意识到物质生活的改善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能以道德规范的形式约束人们的过度铺张的消费行为,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形成一个良性的增长。

6. 实施和谐社会战略,促进利益和谐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正在逐步建立中,且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这种情况表明,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中国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中国经济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虽然在经济成就方面成绩斐然,但由于这种经济体制以及相关制度不完善和不健全加剧了社会阶层的

分化,使经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和问题丛生,诸如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存在,这些都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只有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妥善处理好诸多利益冲突,才能为营造我国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良好环境,为谋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提供可靠的保障。

实施和谐社会战略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首先应当实现依法治国,完善制度保障,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有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并兼顾初次与再分配、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包容性发展。同时社会各阶层之间应互相尊重、互帮互助,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愿望都应得到尊重,各类创造性活动都应得到应有的支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机制,完善社会管理,形成良好社会秩序,让人们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最后,通过实现生态文明,保障自然环境,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降低经济增长代价。

[参 考 文 献]

- [1] 胡鞍钢. 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是关联性转型 [J]. 求是 2011(4).
- [2] 任保平, 钞小静. 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经济学家 2012(11).
- [3] 陆学艺. 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结构的调整 [J]. 江苏社

会科学 2005(6).

- [4] 李培林.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社会结构转型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5] 费景汉, 拉尼斯. 增长和发展: 演进的观点 [M]. 洪银兴,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6] 王德文, 蔡昉, 张学辉. 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 [J]. 人口研究 2004(9).
- [7] 夏海清. 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就业结构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J]. 经济问题 2012(1).
- [8] 任保平, 钞小静. 以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10).
- [9] 陈国庆.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2.
-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 [11] 刘燕, 万欣荣. 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1(4).
- [12] 王展渊. 人格现代化取向: 独立型人格 [J]. 求索 2003(4).
- [13] 崔功豪. 中国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 [J]. 地理学报, 1999(2).
- [14] 张义忠, 汤书昆. 社会知识化转型中我国国家科普教育基地的可持续发展审视 [J]. 中国科技论坛, 2008(11).

[责任编辑 蒋万胜]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by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REN Bao-ping, GANG Cui-cui

(College of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27, Shaanxi)

Abstract: China is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pre-transformation to post-transformation, whose domain has expanded from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classifies into soc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humanity transformation. The former depends on demographic structure, employment structure, urban and rur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for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latter relies on transformation of men, form of personality and way of life for economic growth. Currently China has entered in the period of post-transformation. In this period we should speed up transformation of our society to enhance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by introducing a new policy of human resources, bringing into action the steps for new urbanization, quicken social informationization, promoting social better education, and advocating reasonable consuming conception and interest.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humanity transformation;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